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李侃 主编



司马光评传

——忠心为资治 鸿篇传千古

宋衍申 著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 史学家系列 · 李侃 主编

K825.81/5

司马光

—— 忠心为资治 鸿篇传千古

宋衍申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评传

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85463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

司马光评传

——忠心为资治 鸿篇传千古

宋衍申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1225 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7.5印张 插页8 178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3次印刷

印数:6 201—9 200册

ISBN 7-5435-2209-8/K·27 定价:13.50元

证书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一书，在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特颁此证。

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评选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四月





司马光像



全身像（明代所刻）

山西省夏县所存司马光

之華執經露門視詔
苑而介讀之操既奏儀
禁塗論議之公亦補副
時道朕惟國必有史官
難其人所以謹後世之傳
明四方之志冀筆之公
日不固能詳前代著作
第續之書訓譚所視
必資良直之美用陽悅
風我清君才允當道
翰林學士兼侍讀
士朝彪大夫右議大夫
奉制誥攝脩歷代君臣
之制定封事判尚書都

授予司马光史馆修撰之告身(任命状)之一

之華執經露門視詔
苑而介讀之操既奏儀
禁塗論議之公亦補副
時道朕惟國必有史官
難其人所以謹後世之傳
明四方之志冀筆之公
日不固能詳前代著作

授予司马光史馆修撰之告身(任命状)之四

意提舉萬壽觀公事兼
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
判巨野所上封章檢閱
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百戶食實封貳伯戶
金魚袋司馬光學士以
古今之變文足以昭典

授予司马光史馆修撰之告身(任命状)之二

元年二月八日
奉
以右議大夫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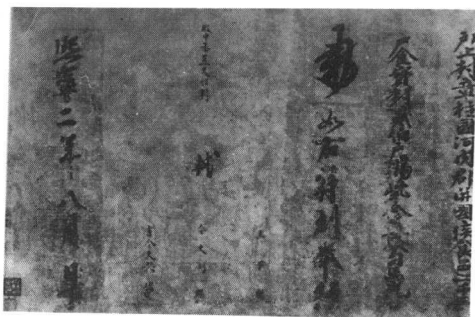
授予司马光史馆修撰之告身(任命状)之六

之規舉一時哀沮之法惟
尔所善弗假訓言可特
依前右議大夫翰林學
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
兼修撰官兼道勳
食實封貳伯戶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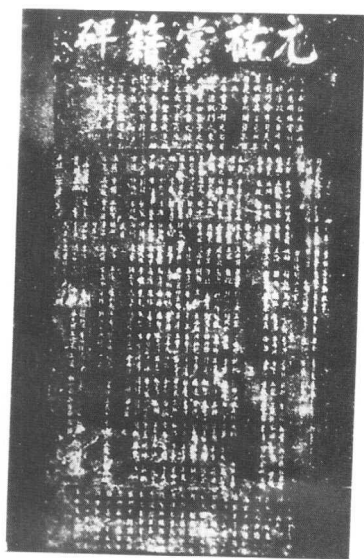
授予司马光史馆修撰之告身(任命状)之三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日
奉
以右議大夫翰林學士
兼侍讀學士知制誥
兼修撰官兼道勳
食實封貳伯戶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日

授予司马光史馆修撰之告身(任命状)之七



授予司马光史馆修撰之告身(任命状)之八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县所发现的
残存《元祐黨籍碑》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总 序

戴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数有益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也包括汲取有益的政治经验、治国方略、管理方法，至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科学思想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素材。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文化现象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形成了文化的不同门类。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覆盖面更为拓展，文化的内涵日益深邃，在各类的文化活动中也涌现了各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者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或以自己的言论形成一种思想体系，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他们努力钻研，求实创新，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步步推进，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些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数量之多真如恒河沙数。我们把这些明星贯穿成线，就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史。

广西教育出版社倡议编写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一项有卓识有魄力之举，因此立即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响应，在几位著名学者主持下，分别组成各系列的写作队伍。由于作者大都长期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因此很快完成了一批书稿。以作者队伍整齐，书稿质量高而言都是少见的。

本系列丛书没有采用学术著作的传统写法，也不对历史事实作子虚乌有的夸张演义，而是本着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的叙述。作者的观点或通过分析评论表述，或者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尽量融会吸收。

本丛书所拟定的传主选题，代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各方面，虽然各位传主卓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册，但却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们身上既有耀眼的光华，又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历史和个人的局限，甚至不无糟粕。这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称颂、肯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时，也要取这样的态度。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感谢丛书的各位主编、作者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希望本丛书能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是为序。

1994年5月

序

李 侃

尊重历史，编纂史书，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

古人有很多重视历史的精辟言论，如“彰往而察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

正是由于对历史的重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才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代有创新，不断发展，也才能够使得在经过千百年之后，后人还得以从这些历史典籍中窥见以往年代的社会治乱、朝代兴衰、政教得失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我们在接受、领悟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赐予的时候，对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史学家，不禁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

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们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独特的、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史学家的职责作为文化领域的一种分工，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史学家工作的成果是反映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与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记载及依据。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之所以被完整地记载下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至今还可以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古代史学家的一大功绩。

在这套《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中，我们选择了8位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入传，用以反映中国悠久的

史学传统及其在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成就。这8位史学家是：司马迁（西汉）、班固（东汉）、刘知几（唐）、杜佑（唐）、司马光（北宋）、郑樵（南宋）、章学诚（清）、梁启超（近代）。这8位史学家是包括从西汉到近代的史学家的代表，他们的著述和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典籍的多种体裁，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跟社会的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的辉煌成就。

司马迁著《史记》，创纪传体（综合体）通史，并以其深刻的历史哲学、生动的历史表述和以多种体例相配合，描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前期大约3000年的历史大势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的言论、行事与历史功过。《史记》的伟大成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班固受《史记》的影响而断代为史，著《汉书》，开封建社会皇朝史撰述的先河。《汉书》中的10篇志，在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有突出的贡献。后人把《史记》、《汉书》尊为历代“正史”的开山之作。

刘知几以批判的眼光，自觉地对以往的史学工作进行回顾和审视。他著的《史通》一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在中外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杜佑重视史学的“经邦”、“致用”，所著《通典》一书，创典制体通史而意在“将施有政”。他是一位通晓政治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洞察历史的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叙战国到五代1300余年史事，旨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一部“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宏伟著作。

郑樵继承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阐扬史学的“会通之旨”，所撰《通志》一书，是纪传体（综合体）通史，而其卓越成就尤在于《通志·二十略》，显示了他在典章制度、名物

训诂、自然知识方面的造诣。

章学诚生活在考据之学盛行的乾嘉时期，而他治史的旨趣却在于理论的追求，所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从理论上总结了18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辨“史法”、“史意”之区别，论“史德”、“言公”的重要，发展了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说等等，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上提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先驱，他在20世纪初年提出的“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理论，批判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史学改革和创新起了开拓性的作用；他在本世纪20年代的历史撰述，涉及到历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许多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有广泛的影响。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这是一支宏伟的队伍，是一座丰厚的宝库，体现着一个优秀的传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史学家的不同风格和特点，不同的成就和贡献，看出中国史学的连贯、繁富和成熟。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我们能够列出有成就的史学家可以以百数。他们的著述，可以汗牛充栋；他们的贡献，可以彪炳千古；他们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的一部传记体的中国史学史。从我们所介绍的8位史学家的成就，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一部中国史学史，该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宝库！

中国史学在两三千年的积累、发展中，不但造就了众多的优秀史家，也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里，我只想说明两点。

第一，不断创新的传统。

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都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后代史学和史学家对于前代史学和史学家，既有继

承，又有批评，既有扬弃，又有创新。这种继承、批评、创新、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史学内容愈益丰富、体裁愈益多样、范围愈益扩大、方法愈益完备、史观愈益进步，而终于走上科学轨道的过程。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迁延证明了这一点，而从古代史学到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进而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的转变，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发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科学事业。史学工作者在向这个科学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反复的科学实践。这种探索和实践，绝不可忽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不可忽视中国史学遗产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二，关注现实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史学与每个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从孔子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而“作《春秋》”开始，后世许多史家，虽各自的史学思想、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离开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治乱盛衰去空谈历史。至于近代中国的许多著名史家如魏源、梁启超、章太炎诸人，他们本身就是政治革新家、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则是共产主义战士，历史学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专门的科学，同时又是维新和革命战斗的思想理论武器。尽管这个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但也有贯穿古今的精神本质，这就是史学家们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正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的优良史学传统。

盛世修史，继往开来。值《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推出之际，谨抱病以陈言，怀古贤，励今哲，翘首于后生。此乃一老史学工作者之赤诚也。

1995年7月

前 言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第一流的史学家。他少年击瓮救友，中年主编《资治通鉴》，晚年罢废“熙丰新法”三件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国古代人物中，获得他这样广泛的知名度的并不多见。

司马光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尤嗜史书。大约到15、16岁时，已是无书不通了。年仅20岁便中了进士甲科。入仕以后，先后在今天的陕西、江苏、河南、山东、山西做过州、县地方官，但多数是长官的助手，而且任期都不长，无突出政绩可言。

司马光的声望是做了朝官以后，才逐渐高起来的。他历任北宋仁、英、神、哲四朝，先后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铨、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和审官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坚辞枢密副使、出知永兴军，判西京御史台。在西京洛阳15年，以修《资治通鉴》为事。王安石变法失败，哲宗幼

冲即位，高太后临朝，召为门下侍郎（副宰相），旋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相），主持朝政。他以残病之身，数月之间，尽罢“熙丰新法”。正当任重道远之际，天不假年而逝，享年 68 岁。

司马光生当北宋中期，社会矛盾尖锐，“三冗”和“二虏”困扰北宋朝廷。早在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有识高级官吏便发动了“庆历新政”，但是流产了。这样，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见加深。朝野上下，包括神宗皇帝，都有山雨欲来之感。所以，改革时政，成了更加普遍的社会呼声。这时的司马光正当中年，他以忧国忧民之心，上奏了许多奏札，为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设计改革方案，其用心可谓深矣。不过，他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北宋王朝这座大厦尚未大坏，无需大翻修，只要稍事调理，动点小手术，把太祖、太宗那时的祖宗之法，重新实行起来，就可解决问题。可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法”派，则不以祖宗之法为然。王安石执政后，雷厉风行地摧毁了许多旧法，推行了一套新法。这样，就与司马光产生了政见的分歧，这一对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从此分道扬镳了。但是，当我们具体分析他们各自的主张时就不难发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并非改革不改革的分歧，而是如何改革的分歧。概而言之，是稳健的改，还是激进的改的分歧。王安石激流勇进的精神是可赞的，他的多项改革措施，抨击了时弊，实行后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掺进了不少主观躁进的成分，树敌太多，老百姓也未从“新法”中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失败了。而司马光一贯坚持的政见，则获得了比较广泛的拥护，所以司马光虽然不预朝政十几年，却被视为“真宰相”，田夫野老、儿童走卒，都把解决天下累卵倒悬的希望，寄托到这位“真宰相”的身上。这便是他晚年以残病之身，不消数月，把王安石苦心经营近二十年的“新法”一扫而光的主要背景。

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闲居，为他从容地编修

《资治通鉴》创造了契机。当然，必须指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并非完全针对着“新法”。小时读《高氏小史》已启其蒙，稍后又憾于古往今来，史籍浩博，学子不易遍读，出于一种文化延续的责任感，他决定亲自动手，用编年体的形式，为广大读者写一部简明通史，自名曰《通志》。借官职之便，他把自己写的先秦部分的初稿，讲给英宗皇帝听，结果大受赏识。从此，纳入官修轨道，神宗皇帝即位，又预作了“序文”，命名为《资治通鉴》，“眷遇之荣，近臣莫及”，“夙昔所愿，一朝获伸”，从此他修史的目的完全转向为帝王写历史教科书这一主旨上来了。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负盛名的，其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精详、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是首屈一指的，人们每每把它与《史记》并论，司马光也和司马迁被并称为史学“两司马”。这部书的写作主旨虽然是为皇帝资治而用，但从它诞生后，就不只为皇帝所专用，而是很快普及开来了。至今九百年来，不知再版了多少次，多少部。总之，不论社会如何变迁，从未间断流行过，已成了上至皇帝下至一般读书人案头必备之书了。它的社会效益可与任何一部古典名著相比美，即使在当前也不能低估它的价值。过去是，现在也是，当着向历史取鉴时，是不可舍《资治通鉴》而不读的。至于研究司马光其人和《资治通鉴》其书的学者，九百年来，更是风起云涌，代不乏人，蔚为大观。

司马光的一生是正统儒学家的一生，他办事脚踏实地，惟诚惟一，光明磊落，像做学问那样做人，像做人那样做学问。即使他的政敌，对他的这些优秀品格也深致赞誉。

一段时间内，学术思想界在评论司马光和王安石时，往往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实践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两位历史名人，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都有多方面的贡献，都不愧为历史伟人和文化先哲。对于他们